

诗性的蓄聚与迸发

——《艾约堡秘史》阅读笔记 □龚曙光

历史感与历史性

曾经动念,给《艾约堡秘史》改个书名。我想去掉的是“秘史”二字。不论是基于人物命运的秘史,还是人物心灵的秘史,把“秘史”标在书名上,都还有点探案剧的味道。以张伟的名头、实力和决绝的纯文学追求,他最终选择这一书名,断然不是出于市场操作的考虑。我揣摩,张伟真正舍弃不掉的,还是这个“史”字。

一部描写最近半个世纪社会嬗变的小说,故事终结的时点,几乎和写作终结的时点重合。学界常说“当代无史”,张伟执拗地将一部当下生活故事,赫然标上“史”的名头,可见他对这部作品历史价值的看重,还有作家对自己历史穿透力的自信。

文艺复兴以降,多有大家从诗出发,到史落脚,写出一部部编年史、心灵史以及史诗。如写编年史的巴尔扎克,写心灵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写民族史的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尔克斯……这些都是张伟敬重且亲近的作家。我所说的亲近,是指心灵上的吸引和交融。我们常常会敬重很多作家,而亲近却需要生命和性灵上的真正共鸣。

几乎从创作伊始,张伟就只有一个文学目标——史诗。《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鸿篇巨制不用我说,即使是他的短篇、中篇、散文乃至诗歌,都总有一种朝向史诗感的执着努力。尽管在张伟的创作中不乏清静得如一泓秋水的抒情诗章,但张伟创作的本质追求是史诗性。张伟创作的丰富性,是在史诗性这一根基生发的,是基于史诗性的枝繁叶茂和摇曳多姿。

史诗就是用歌谣传唱的历史吗?或者说,史诗就是记载历史的诗性文本吗?我始终觉得,史诗的诗性主要不来自于记载文本,而来自于历史本身,来源于历史过程中最具诗性的细节,最富想象的故事和最富灵性的人物,是从历史的完整性中裁切和淬取的历史本质。真的史诗,不仅是对历史感的描摹,更是对历史性的发掘。

在张伟的小说中,历史性是其诗性的源泉和根基。从《古船》开始,张伟始终把笔触伸向历史浮萍之下的深水,寻找静水深流中的历史走向。通俗地说,张伟致力于为历史勾魂。只有历史的魂魄,才能激发歌者的抒情,值得歌者深情吟唱。

《艾约堡秘史》在历史时段的选择上是一次突破,对当下生活在没有足够距离感的状态下实施历史透视,其险巨大,

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张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持有一种谨慎的批判与反思姿态。虽然说这方面的思想心得在他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已经有着近乎同步式的体现,但相比较而言,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版),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小说的主人公艾约堡主人淳于宝册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关于淳于宝册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我们只需对他的私人府邸艾约堡略有了解便可推想而知,“偌大一个艾约堡可能是天底下最庞大最怪异的私人居所,严格讲是一座隐秘府邸。它分成东西两大区域,二者又紧联一体。第一次被领到这座堡前,也就是三年前的那个下午,她在橘红色的晚霞中看着依傍一座葱茏山包筑起的两层小楼,不禁泛起稍许的失望。”艾约堡本身的设计,其实充满着象征色彩。如果把艾约堡所占据的那座山包理解为大自然的一种象征性存在,那么,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把如此一座山包硬生生地挖空,将其彻底改造为一座私人府邸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强大的资本力量对于大自然的严重破坏乃至干脆侵吞。从这个角度来说,艾约堡的设置可以被理解为整部小说的一种象征性预叙。整部《艾约堡秘史》的主体故事情节,正是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与大自然之关系的缩影,也即以吴沙原和欧陀兰为代表的海边渔村矶滩角村之间的激烈碰撞与对抗。

作为一部旨在对资本罪恶进行深度批判的长篇小说,张伟在《艾约堡秘史》中把尖锐的批判矛头首先对准了淳于宝册的狸金集团。狸金集团的罪恶,首先表现在意欲侵吞包括矶滩角村在内的海边三个渔村以谋求所谓的人海口。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淳于宝册与吴沙原的对话中。当吴沙原提出“三个村子一起兼并吗”的问题的时候,淳于宝册给出的回答是:“一起。这是狸金梦寐以求的。”围绕这个兼并方案,淳于宝册又进一步给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强调这一兼并是所谓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兼并三个渔村,明明是狸金集团处心积虑的一种企业发展策略,到了淳于宝册口中,却被贴上了“城市化”的堂皇标签,而且还被说成是他们集团本来就不想背负的沉重包袱。如此一段失真话语背后所透露出的,正是淳于宝册这个人物生性中虚伪的一面。

其次,狸金集团意欲兼并矶滩角村等三个渔

村当然其诱惑也巨大。茅盾先生当年创作《子夜》的历史胆魄和艺术成功,对张伟应该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招引。清末以降的中国社会,张伟先后以不同的长篇进行了正面的表现,只有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还留一段空白。由当代而抵近当下,这是张伟长篇创作的一个宏愿。从20年前开始,张伟就为这部作品做创作的准备,可见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动念和意外的灵感,而是一次深远的艺术预谋和长期的诗情蓄聚。

然而,要为几乎每个读者经历甚至参与的历史存照,要抵御仍在生长的社会思潮、文化风尚和民众心态的影响,完全自主地去把握、评判和表现这段演进着的历史,对张伟仍是一个难题。张伟再一次拂去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再一次放弃以历史感取悦读者的便利,坚韧地走向历史性。其实,一个屡见不鲜的暴发户故事,很容易唤醒读者生活的亲历感;一个数省首富的黑幕生活,又极易引发读者的好奇心和道德义愤;商业操作的手段在一个全民皆商的时代,还可能成为读者关注的商业案例……张伟放弃了这一切,决绝拒绝以历史感来取悦读者博取人气。

张伟塑造的淳于宝册,是一个饱经穷困折磨,最终戮力奋斗成为巨富的人物,张伟将人性置于极贫与巨富这样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特殊炼狱,考察我们民族良知的坚韧和人性的强大。小说表现的这半个世纪,的确是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特殊时代,国家由积弱到强盛,国民由极贫而暴富,不是某几个人,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这种由贫到富的大翻转,让所有人猝不及防,让所有人灵魂裸露。张伟捕捉到了一个比任何时代都更具极致的历史时段,将人性放置在经济的烈焰上焚烧,观察其卷曲、焦化乃至复活的苦难历程。

阳光少年与忏悔者

苦难,一直是张伟小说表现的基本主题。从《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你在高原》,到新近出版的《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几乎所有的主人公,甚至主要人物,都生于苦难、长于苦难。苦难始终是张伟观察人性,表现人性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可以说,张伟是中国当代作家表现苦难最执著、生动、丰富和深刻的作家,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言,张伟以他对苦难深刻的体察,生动的表现和独特的文本,抵进了民族生存的本质性、人性的独特性和审美的深沉性。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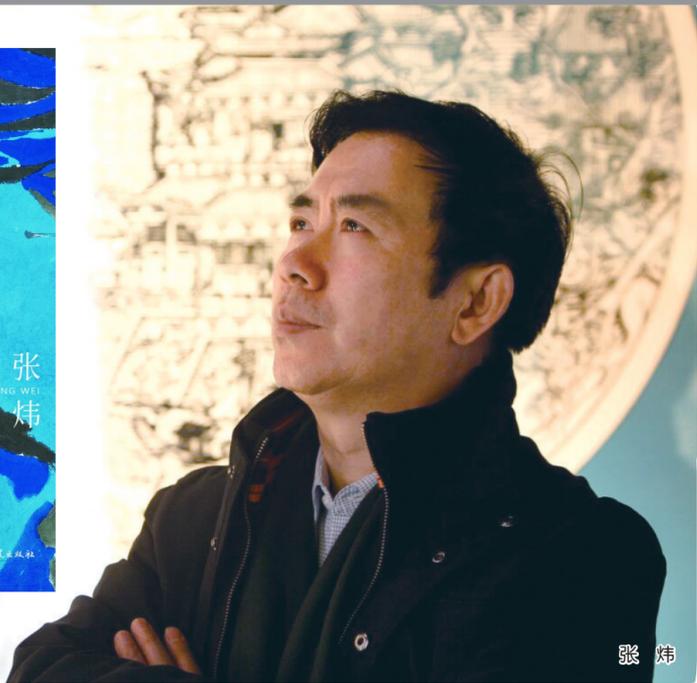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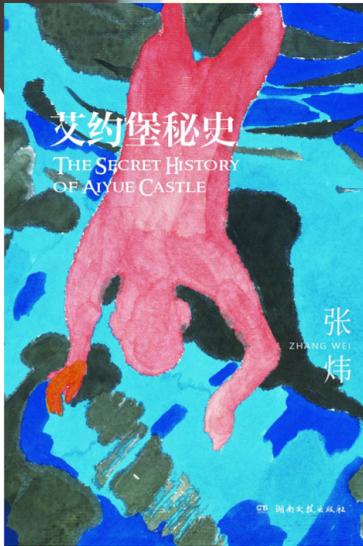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俄罗斯的苦难,雨果笔下法兰西的苦难,马尔克斯笔下哥伦比亚的苦难,张伟笔下的苦难就是中华民族苦难的苦难。

张伟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如同抱朴、见素兄弟一样,挣扎于苦难又成长于苦难,《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和吴沙原,都是在苦难中滚大泡大的汉子,他们的坚韧与强大,全部来自于各自经历的非人可以承受的苦难。作为一个流浪儿的淳于宝册,自幼经历丧亲、毒打、拘囿、侮辱和长期饥饿的折磨,从山里到平原再到海边,漫漫流浪之路,一路饥饿,一路屈辱,一路血泪,然而即使是在奄奄一息的时刻,仍旧艰难地活下来;即使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刻,仍旧决绝地逃跑,下一个流浪的站点便是他的新生之地,每一段逃离的里程都是他的希望之途。张伟没有着力表现淳于宝册的发迹史,而是将笔墨集中在他苦难的流浪中。张伟似乎想告诉我们,经历了如此巨大苦难的人,成就任何人间奇迹都很正常,遭遇任何上天眷顾都理所当然。

张伟表现苦难,却不让苦难窒息人物,也不让苦难窒息小说外的读者。他小说中每每出现的流浪少年始终是阳光少年,他们善良、纯洁、坚韧、乐观,尽管每一步都走在苦难上,却永远在不停歇地奔走。苦难像镀在他们身上的一层金光,经历的苦难愈多,便愈发金光闪闪。

阳光少年是张伟小说的一道奇异景观,一个深刻隐喻。既隐喻着张伟面对苦难的人生态度,也隐喻着中华民族的“生于苦难长于苦难”、不屈不挠不死的精神。那是一种生命苦难的吟唱,命运困厄的抒情。张伟擅长将命运的不幸遭际转化为精神的自我历练,将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灵魂的抗争。淳于宝册少年流浪生涯中,面对邪恶和强权,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逆咬啮”,但这些肉体的侵害和灵魂的凌辱,都集聚成了心理能量,最终积攒成一种人生反抗的不竭动能。我很迷恋张伟这种苦难的吟唱与困厄的抒情,那是一种柔弱中隐含坚韧,绝望中催生希冀的人性基调,寒冷而温暖,低徊而昂扬。当这一切都从一个流浪少年稚拙的目光和清亮的歌喉中传递出来,我们每每能从寒冷大地的历史背景上,看到一个奔走于苦难高原的金色精灵。

除了阳光少年,张伟小说中还有一类人物令我着迷,就是那些饱经了人生苦难,具备了巨大反抗能力,却始终纠结于内心的男人,他们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敏于心而缓于行,也像陀



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不满于忧愤而又沉溺于忧愤,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险恶或者荒诞,却始终在内心拷问自己的对错。粉丝作坊里默坐如一块青石的隋抱朴,艾约堡中蜷缩如一头困兽的淳于宝册,他们用坚强的身躯抵抗外部世界的灾难或者诱惑,在内心与自己较劲。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隐忍的力量。张伟能轻而易举地把小说外在的故事冲突,转化为人物内在的灵魂纠缠,使人物一方面在情节冲突中与命运抗争,一方面在心理冲突中自我救赎。人物被挤压在情节中,又被抛弃在情节外,困囿于内心的自我拷问与忏悔,不间断不停顿的灵魂自白,如刀子般地直逼读者的心灵。这种诗剧式的人物独白和内外冲突构成的双重叙述压力,是张伟小说的绝技。

精神高贵与文本高贵

作家精神品质的贵贱决定了作品的贵贱。有情怀与无心肝,耽于情色与专注灵魂,关切苦难与献媚幸福,炫耀技法与归于本真……这一切区分了作家精神与作品品质的贵贱。我一直认为,张伟是一位精神高贵的作家。在我的作家辞典里,这是一串并不长的名单。

张伟以其对人类苦难从始至终的关注,将笔触抵进了世俗生活的最底层,无论历史在演进或倒退中如何嬗变,张伟最为关注的,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被剥夺,在社会学意义上被凌辱,在哲学意义上被异化,在伦理学意义上被歧视的人群。在《艾约堡秘史》这部以富翁为主人公的特殊题材的小说中,虽然作家对淳于宝册因财富带来的心灵痛苦给予了足够的表现,但作家的同情,却始终倾注在海边渔村的渔民身上。作为对手的村头吴沙原,小说中另一个饱受苦难而依旧贫穷,饱经折磨而依旧坚毅的汉子,面对狸金

这部巨大经济机器的碾压,他的惊恐与无奈远胜于海滩上的任何一位渔民,他的痛苦与忍耐亦远胜于渔村里任何一位村妇。

若以题材论,《艾约堡秘史》有足够的理由展示暴富人群声色犬马的奢华生活,炫耀商业巨子惊世骇俗的成功宝典,渲染物欲社会千奇百怪的情色场景。这一切无疑能为小说招徕更多的读者,而张伟却视若无睹地依然专注于苦难的表现。饱受贫穷苦难的淳于宝册,如今却要承受财富带来的巨大痛苦,过去因为贫困而“逆咬啮”,如今却因为暴富而要“逆咬啮”。在小说中,淳于宝册视财富为苦难之源,却又饱食财富苦难之果。在这段贫富顿然翻转的独特历史中,张伟企图揭示苦难之于人性的本质意义,之于人生的永恒意义。

张伟以其对于人类心灵从始至终的关注,将笔触抵进了人性的最深处。在当代作家中,我没有发现谁比张伟更关切灵魂。在张伟的小说中,无论人物出身富贵还是贫贱,无论人物命运顺遂还是乖悖,其灵魂却总是纠缠而痛苦的,永不间断的自我拷问、永不停歇的自我倾诉,既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又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人性的极端性。抱朴与四爷爷之间,在灵魂的对决上互为仇敌,同时在抱朴的内心,其灵魂又互为对手;季旌非与康承德之间,淳于宝册与吴沙原之间,无一不是如此。邪恶与良善、挚爱与大恨,既在人物之间较量,又在人物内心冲突,由此流泄出对于人类绵绵不绝的怜惜、悲悯和救赎的爱意。

张伟以其对于历史性从始至终的关注,将笔触抵进了历史变革的切要处,张伟从不迷恋于眼花缭乱的枝节,也

不对某一段生活作清明上河图式的描摹,他关注的是历史变革的根本性冲突。《艾约堡秘史》将淳于宝册置于极贫与暴富的剧烈对撞中,隋抱朴直面的是在历史合理与道德邪恶夹击中生人反抗的两难和人性救赎的艰难;淳于宝册面对的是由贫而富骤变中人生的失败和人性的迷茫。这一切,既属于人物,也属于人物所处的时代,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性。

张伟对于苦难、心灵和历史性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人生、人性和历史本质性观察的高贵追求,体现了他对人生关切、对人性救赎、对历史评判的高贵情怀,体现了他不为人生苦难窒息,不为人性邪恶扼杀,不为历史谬误胁迫,坚忍不拔的高贵信念。这一切,合成了张伟文学精神的高贵性。

抒情性是张伟小说叙述的重要特征。不论是第一人叙述事、还是第二、第三人叙述,不论是全能视角叙述,还是拟人化叙述,张伟的叙述都贯穿着浓郁的抒情特质:不仅是每到情节冲突处激发人物心灵的自白式抒情,而且整个故事都充满叙述中的抒情意蕴;不是某场景或细节,而是切割下特殊历史时段中那些最富诗性的人物和故事,一如我们读到的史诗。

对灵魂的审视与揭示,对心理力量的蓄聚与迸发,使一切外在故事与情感,在灵魂之光的烛照下通体透明,在心理之火的焚烧下凤凰涅槃。无论作家反映的历史如何荒唐,塑造的人物如何污浊,表现的生活如何黑暗,然而小说的文本,却具备了生生可感的高贵品性。

高贵,是一个诗性作家的当然品格和惊世力量。

资本批判与人性忏悔

——关于张伟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 □王春林



村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以吴沙原为代表的矶滩角村人的坚决反对。为了达到兼并的目的,狸金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了各种非法的罪恶手段。依照吴沙原的说法,狸金集团在矶滩角村的所作所为已经算是很客气,算是给他留面子了。在其他村子里,狸金集团的手段会更加极端与残忍,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狸金集团如此强劲的资本力量面前,一切都得乖乖让路。一旦试图反抗,结局便会特别凄惨。即使是狸金集团内部的工作人员,只要触犯了集团内部的禁忌,也会死得很惨。

第三,狸金集团的罪恶,也表现在对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上。对此,吴沙原同样有着一针见血的揭露:“据我所知狸金周围的村庄没有不怕你们的,你们先后兼并了五个个村庄,这些村的人逃掉了,好多,一些家庭也受到牵累。靠近化工厂的三个村子几年内患病率上升,其中癌症患者是过去的好几倍!有不少失踪的人,其中最多的是女性!全市最大的水源地被污染了,两条河里没有鱼,连草都枯了,治理三年没见一点成效。”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肆意吞并如同矶滩角这样的村庄,另一方面在随意草菅人命的时候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凡此种种,皆属于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在自身日益发展壮大过程中所犯下的现实罪孽。但请注意,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所有资本的积累与发展过程,实际上都少不了与现实权力的结盟与联姻。这一点,在狸金集团的初始起步亦即原始积累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

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淳于宝册系列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老政委角色。虽然这位名叫杏梅的强悍女性口口声声离不开“战争”,但她的所谓“战争”却不是“文革”期间的武斗而已。在那个动荡不已的岁月里,杏梅所在的“磨盘山游击队”一个抢粮的功绩,就

是从政治对手那里硬生生地抢出了一一个身负重伤的高位领导。正是因为这一突出,杏梅与上层政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与淳于宝册结识并决定加盟他的事业之后,老政委充分利用她和首长之间不无暧昧色彩的紧密关系,助力淳于宝册的狸金集团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经营范围辐射到很多方面的资本巨无霸。对于老政委所发挥的特别作用,淳于宝册曾经以形象的话语加以描述:“她认为我从事的既不是工业也不是商业,而是一场战争,身边要有一个‘政委’。我离开她心里空荡荡的,后来就开始想念,有时是半夜,一刻都不能等待,天不亮就急着上路,开了公司的快车。”老政委与首长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为首长全力支持狸金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老政委的存在,为淳于宝册和首长搭建了很好的桥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老政委这样一个纽带,才有了淳于宝册和首长,也即资本与权力之间结盟关系的建构。威权者,老首长也;资本者,淳于宝册或者说狸金集团也。正因为有了来自于政治权力的强力支撑,所以如同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方才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似的在矶滩角村横行霸道肆意妄为。

然而,从自我的社会生存经验出发对资本进行不无严厉的尖锐批判,仅仅是张伟《艾约堡秘史》一个方面的思想艺术成就。在强调小说社会价值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小说更应该是一种深度挖掘、勘探复杂人性世界的文体形式。在张伟《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刺猬歌》《你在高原》等一系列带有市场经济批判主旨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似乎已经不再能够耐下心来做细致深入的人性体察,更不用说再次企及他在《古船》中曾经抵达的人道主义忏悔的思想高度。尽管说罪感意识或者说由这种罪感意识而进一步导致的忏悔精神早在《古船》中即有着相当难能可贵的表现,但遗憾的是,在张伟其后的一

系列长篇小说中,如此一种异常重要的精神线索竟然不知所以然地给断线了。所幸的是,到《艾约堡秘史》中,这种中断已然很久的线索,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这种人性忏悔的精神内涵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淳于宝册身上。淳于宝册固然是一位资本大鳄,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在小说中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淳于宝册在疯狂攫取财富的同时,他的内心世界其实有着相当复杂的一面。

比如,从情感世界来说,淳于宝册是一位曾经饱受伤害的情种。这方面,先后与淳于宝册发生关系的女性最起码不少于三位。首先是那位带有毛遂自荐意味的老政委。与年长自己五六岁的老政委相遇相识,正是淳于宝册的资本事业初始起步的时候。老政委杏梅不仅从外表上看是一位男性化倾向非常明显的粗壮女性,而且从其一贯的行事风格来说,她往往是生活的主动者。与淳于宝册情感的关系中,她也是强势的,进与退的主动权始终把握在她的手中。一方面,淳于宝册资本事业的发展的确少不了来自于首长的助力,离不开老政委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在接受如此一位精神早已出轨的老政委为妻的过程中,淳于宝册情感上所受到的伤害,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弥补情感世界曾经遭受过的严重伤害,所以也才有了蛹儿这样一位情感补偿者粉墨登场的机会。虽然此前也曾经经历过两位男性,但很显然,与老政委的强势、飞扬跋扈相比,蛹儿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温柔,就是逆来顺受。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淳于宝册之所以会日渐失去对蛹儿的兴趣,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她本身主体性的极度匮乏。因而才有了第三位女性,也即民俗学家欧陀兰。不论是千里迢迢地远离京城长期驻扎在矶滩角村进行田野调查,还是她捍卫自然与文化原生态的坚定意志,抑或是最后面对狸金集团高薪聘请时的严

词拒绝,所有的这一切,彰显出的正是她身为现代知识分子强大的主体人格。欧陀兰在淳于宝册的心目中之所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正因为她在精神与情感上被欧陀兰彻底征服,所以淳于宝册让雕刻匠将想象中的“二姑娘”雕塑成了欧陀兰的模样,而且还使出浑身解数意欲将欧陀兰收归到自己麾下。

再比如,从阅读和写作的角度来说,淳于宝册简直堪比一位作家。他之所以能够在书店中发现蛹儿这样一位“天生尤物”,与他长期形成的良好阅读习惯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与阅读紧密相关的,自然就是淳于宝册的写作行为。关于淳于宝册的写作,张伟不无嘲讽地做出过这样的介绍:“这儿有一排排书,还有一个精致的欧式书柜,里面是一大排烫金仿小牛皮的棕色精装书籍。生人凑近了这套书会大吃一惊,因为书脊上一律印了‘淳于宝册’。伟大的著作家近在眼前:鬍毛,牙齿内扣,不足六十,有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老肚带通晓这些书的来历:主人兴之所至大讲一通,旁边的速记员刷刷记下,然后交给秘书处,那里的头儿老檀子就有事情做了。他们一伙分门别类写成‘理论’‘纪事’‘随想’,扩充成一大堆文字。”虽然有手下人捉刀代笔的嫌疑,但究其根本,淳于宝册能够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如此一种书写工作中,就绝不同于寻常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其一定程度上精神气场的存在,乃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

但不管怎么说,最能够见出淳于宝册这一人物形象人性深度的,仍然还是他那并非彻底的内在忏悔精神。淳于宝册的忏悔意识,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对狸金集团的排斥与厌恶中,淳于宝册是一个内心世界充满着自我分裂感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是他殚精竭虑地顺应时代大潮,开创了狸金集团,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成为资本时代的资本大鳄。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内在激情的诗人气质非常明显的嗜读者,他对金钱与财富,以及疯狂攫取金钱与财富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厌恶,自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虽然说张伟在《艾约堡秘史》中关于淳于宝册自我忏悔的相关描写,其艺术的成功度较之于原来《古船》中的隋抱朴的确力有不逮,但在当下这样一个资本依然横行肆虐的时代,能够在小说中塑造出淳于宝册这样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资本家兼忏悔者的形象,其意义和价值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